

晚清新式地图出版业兴起的历史考察

李 鹏

【摘要】在晚清社会维新、救亡图存的背景下,伴随西方新式印刷技术的传播,以武昌、上海等地为中心,各类地图出版机构相继成立,初步建立起地图编绘、出版与发行的流通体制,有效促进了新式地图的出版与传播速度,进一步提升了地图出版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标志着近代中国地图出版业的初步形成。本文通过考察晚清新式地图出版业兴起的历史过程,分析不同类型机构地图出版发行与经营流通的特点,认为近代地图市场主体从官方向学会和民间转换,由西方印刷技术、专业出版机构成立所催生的新式地图出版物,极大推动着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的转型,进而深深嵌入社会文化变迁的脉络之中。

【关键词】晚清新式地图;地图出版;文化政治

【作者简介】李鹏,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原文出处】《社会史研究》(京),2024.第16辑.300~324

【基金项目】本文系陕西师范大学2022年中央高校帮扶基金“剑桥学派与现当代英国历史地理学”、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2年“念海史学”科研项目(A-Q2222)阶段性成果。

作为商品的印刷品是孕育全新的同时性观念的关键。^①

在很多方面,地图有助于人们了解关于国家的知识。作为一种符号,它是一种有效而积极的媒介,通过这种媒介能够塑造出一种地缘机体;作为一种元符号,它本身是一种参照对象,并可以创造出超越其本源的更多意义与价值。它不仅垄断了人们设想国家这一人造宏观空间概念的方法,而且它两方面的角色都让它轻松地控制人们关于民族性的知识,并让国家感成为一种更接近自然的存在。^②

晚清以降,伴随西方新式印刷技术的传入,以雕版印刷技术为支撑的传统地图出版逐渐式微。新式地图出版业以近代西方印刷技术为基础,不同类型的地图出版机构相继成立,标志着近代中国地图出版业的初步形成。^③然而,相比传统地图出版,近代中国地图出版业是怎样兴起、发展的?其背后有着怎样的社会影响?这都是近代中国地图出版

史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

就学术史而言,最早关注“近代中国地图出版业”这一论题的,当为1953年葛绥成《清季民初地图出版工作及出版物》一文。^④近年来,研究者多从地理学史的视角审视晚清“译印地图公会”的源流派分。例如,郭双林对“译印西文地图公会”的性质进行了探讨,认为其既是一个地图出版机构,也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⑤邹振环则从学术网络的建构展开分析,评价该会是“中国近代史上成立最早、历史最长、出版地图最多、在社会上流传最广、贡献最大的一家私营专业地图出版社”。^⑥上述研究将近代中国地图出版业的发展,同地理知识转型、社会文化变迁有机融合,呈现出“知识社会史”的外部理路。

相比地理史学者的外史视角,出版史研究者更关注近代中国地图出版机构的经营模式与内部运作。例如,傅良瑜、周岩、陈竹、文士员等学者对“译印西文地图公会”、亚新地学社的地图出版物、经营

特色、股票发售等诸多方面展开论述,颇具参考价值。^⑦陈潮编著《图情六十年》一书,内容涉及近代中国地图出版机构、出版图目、出版群体等诸多方面。^⑧李明杰、石冰洁等则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分析近代中国地图出版业的文化贡献,可惜未及深入。^⑨

对于近代中国地图出版业研究来说,不仅需要从地理学史、出版史的角度分析近代地图出版机构的经营模式与知识水平,更需要从文化史角度分析地图出版物与文化政治的互动关系。因此,系统考察近代中国地图出版机构的专业化与市场化,深入分析地图出版物对传播地理知识、形塑国民认同的影响,就成为本文的方向所在。^⑩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晚清新式地图出版业的兴起过程及其社会影响。从性质上,是指近代中国地图印刷、出版与发行的专门化;从主体上,包括官方、学会与民营地图出版机构三大类型。

一 晚清新式地图出版业兴起的历史条件

(一)传统地图出版的历史积淀

现有研究表明,由于中国古代地图编绘与使用的主体主要是宫廷或政府,占相当比重的地图文本都“藏之内府”。即使版刻地图在宋明以来书籍市场大量出现,甚至有士人参与其间,但多是“著刻一体”,^⑪多属非营利性的官方或半官方行为。换言之,受限於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背景,中国古代地图的使用与流通多局限于皇室贵族、政府官员与士人阶层,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不脱“王朝地理学”^⑫的范畴。

尽管中国古代舆图多因藏之内府,未能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但传统地图出版并未因此而停滞。特别是自宋代雕版印刷术在地图上的广泛运用以来,地图的使用与流通逐渐向下层知识阶层传播,有的甚至成为年画、折扇与屏风装饰的重要形式。由于普通知识人或民众对于地图,并不需要特别精确和详细,反而地图尺幅越小越容易流通。而这些民间舆图虽不甚精确,但适合大众;尺幅虽不大,却便于携带,因此受到普通知识阶层的广受欢迎,起到了

向民间社会普及地理知识的作用。^⑬

以清代前中期为例,传统地图出版市场的繁荣,客观上促成了《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和《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等私绘舆图的广泛传播,这些舆图逐渐发展为有别于官方谱系的“大清一统”系全图。早在康熙十二年,黄宗羲便绘制过一幅全国地图,其图绘范围主要为内地各直省,并不包括蒙古诸部、西南未开辟的地区,以及西北哈密、喀尔喀、西套、西海等地,这被视为“大清一统”图系的源头。至康熙五十三年,阎詠、杨开沅根据黄宗羲图,增补改绘为《大清一统天下全图》,此图增绘了黄宗羲图所没有的蒙古四十八旗、红苗、八排、打箭炉、哈密、喀尔喀、西套、西河等地。^⑭在上述两图的基础上,雍正三年,汪日昂又进一步改订《大清一统天下全图》,该图系纸本彩绘,现仅韩国首尔奎章阁有藏,纵138cm,横117cm,与前述阎詠图主要为昭示清代版图“大一统”之盛相似,图绘内容“不仅有东海的海上漕运线,在南海沿岸也画了海路”。^⑮

此后,黄千人在上述舆图的基础上,进一步改绘为《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应该说,此图的最终完成,也标志着清代前中期私绘本“大清一统”系舆图初步完成。^⑯此图之后,民间开始出现不同版本、形制、表现内容大多相似的舆图,不少传本被制作为屏风和折扇,用作装饰,流传甚广。^⑰如牛津大学图书馆就藏有清嘉庆十九年木刻本《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纵140cm,横240cm,32张印张拼合,以便于携带,就是以黄千人所绘舆图为蓝本,增订而成的新图。全图覆盖范围东起朝鲜,西抵中亚,北自黑龙江,南至马六甲海峡,以展示清朝疆域版图之盛。^⑱总之,在版刻技术的刺激下,清代前中期“天下一统”系舆图的大量刻绘,有的甚至借助年画铺房刻印发售的形式,不仅占据了当时的民间地图市场,也反映了宋以来传统地图出版的文化下移,为晚清新式地图出版业的平民化、市场化奠定了基础。^⑲

(二)西学东渐与地理知识转型

19世纪以降,西方人挟船坚炮利之威,以欧美

为主体的西方学术文化,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再次大规模传入中国。特别是晚清以来,西学东渐日涌日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西学,并开始用“新学”的概念取代西学之说。^①特别是受惠于晚清西方地理学的传入,大量来自西方和日本的地理学名词或专业术语开始进入中国知识界的概念之中,极大丰富了中国地理学的词汇库。^②正因为“地理学之关系于民智,诚一国兴衰强弱之本”,在晚清危殆的社会局势下,“地理一科,不可不视为学堂中重要之科目”,^③西方地理学的实用价值越来越受到知识阶层的重视,普通知识人的新式地理知识水平逐渐得以提高。截止到清末,伴随近代学制的变迁和地理学教育体系的确立,估计已有200多万人在接受着不同层次的西方地理学教育,^④这都为晚清新式地图出版业的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

换言之,在清末新旧地理知识范式转型的大背景下,特别是新式地理教育体系的建立,必然要求扩大教科书的编纂范围。^⑤由于地图是地理学的第二语言,地理知识非图不明,新式地理学教育体制与地理知识共同体的形成,客观上也促成新式地图市场的形成。而从晚清整个社会需要来看,无论是开辟商埠,还是对外交往;无论是划定租界,还是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都要了解国内外地理形势,对地图的需求必然进一步扩大。特别是新式学堂教育的创立,为供应新式地理学教科书,作为辅助的教学地图也随之诞生。在晚清西方地理学的广泛传播下,一批受西方影响的地理学人,通过翻译、介绍、编绘新式地图,不仅为近代中国地图出版业开辟新局面创造了良好条件,也为晚清新式地图出版机构的兴起奠定了专业基础。^⑥

(三) 新式印刷技术的传入与地图出版

所谓近代新式印刷技术,就是15世纪以来,由谷腾堡开启的,在西欧诞生的以机械操作为特征的印刷术。依据印刷方式与油墨使用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凸版印刷、平版印刷和凹版印刷三种。^⑦应该看到,近代西方新式印刷技术的大规模传入,对于晚

清以来新式地图出版业的影响十分明显。尽管这一时期传统雕版复制地图的做法仍有较强的生命力,但对于日益精细的新式测绘地图来说,西方的平版石印与铜版凹印技术有着诸多优点。例如,有学者就指出:“近代的地图印刷……仰赖于近代印刷术中平印和凹印技术之采用。客观上,近代的地图早已进入实测地图阶段,故注重地图的正确性要求,图上用经纬度来控制相对位置。因此,在地图印刷方法上也需要能适应这一要求。”^⑧

毋庸讳言,相比于传统雕版印刷地图而言,平版石印地图不仅成本低廉,且图绘精美,往往“细如牛毛,明如犀角”,^⑨不差毫爽。特别是五彩石印地图,无论内容、图绘、装帧上都十分新颖,令人耳目一新,反映了时代的气息、西学的影响和大众的期待,^⑩因此广为流行,很快占据了晚清的地图市场。当时上海的洋报刊——《北华捷报》就有这样一篇报道,言该报记者曾获得一张“标示清晰、排版合理”的上海地图,此图系由平版石印,由上海湖北路一家中资石印商出版。这位外国记者极力夸赞此图绘制者对于距离、方向和地名拼写的精确把握,^⑪还评论说:“这么高水准的地图竟是由一名中国石印商出版,这对那些断言中国人在他们视为蛮夷的西方艺术毫无建树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有力的回应。就这份地图的外观而言,我们本土任何一家印刷公司都会称赞不已。”^⑫

此外,凹版印刷技术对于近代中国地图出版而言,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凹版印刷地图甚至比石印地图更为精细。如晚清光绪十四年(1888),一位叫王肇铨的学者曾游学日本,专攻舆地之学,十分留意东瀛沿海之地形特征,广搜日本地图资料,编绘成《日本环海险要图志》一十二卷。然而,由于此书图中幅纤微,难以付梓,作者遂将总图留在日本国采用凹版雕刻印刷。又因各分图系沿海各岛险要,不便交付外人,就自己潜心学习,最终学会了采用凹版印刷地图的技术。^⑬在其1889年所撰写的《铜刻小记》一文中,作者就坦言:

铨一介诸生,痛先人之贲志以终也,思为有用

之学,以继先志,遂东游日本。自揣不文,惟于舆地为性之近。但孤寒无力,提挈无人,薄游三载,始尽其沿海各岛险要,有未备者,更转辗求诸彼国海军署中。成书十二卷,于口岸形势,纤细毕载。是时遵义黎公,出使是邦,先以呈之公,公阅而首肯。今年春,始得以咨达海军及总署北洋诸处。只以卷帙繁重,图幅纤细,力难付镌,仅于戊子春将总图付诸铜版。因知彼国刻铜之法,创自泰西,较之石印为精。虑分图之未便再假手东人也,乃考求其法,研精而习之,尽得其方。爰分绘刻铜诸器,各系以说。^③

由此可见,正是在西方新式印刷技术的推动下,晚清以降中国地图出版业的技术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特别是从19世纪末开始,近代中国的地图出版技术已经从单色印刷发展成彩色印刷,地图的承印材料、装帧风格都有了较大改变,地图成品的质量更加精细美观。新式地图出版机构积极采用新的印刷技术,从而带来近代中国地图出版业的技术升级与行业转型。如1896年武昌舆地学会邹代钧就积极运用五彩石印技术印刷地图。1898年成立的亚新地学社使用两台四开石印机印制地图,成为第一家采用西方印刷技术的专业地图出版机构,由此也带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积极改进地图制版印刷技术。^④由此,近代中国的地图出版业逐

渐兴盛起来。

二 晚清官方地图编译与出版事业的发展

(一)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地图编译与出版

1867年,徐寿向位于上海的江南制造局会办提出设立翻译馆,在征得曾国藩的同意后,1868年6月,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见图1)正式开馆,该馆位于江南制造局西北隅,是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政府出面,组织人员进行西书翻译的官方出版机构。翻译馆创立之后,十分注意对西方新式航道舆图的翻译与出版,特意“从外洋购得中国沿海各图”,^⑤服务于近代中国的江海行轮与海防建设。对此,曾国藩赞许道:“(翻译馆)拟译西人所画长江沿海各图以测水道深浅,轮船行驶海中,断不可无此二法。而舆图之学,又不仅为船行江海之用。”^⑥

1874年,由傅兰雅(John Fryer)等翻译的《海道图说》正式出版,开启了晚清官方新式地图出版的序幕。^⑦此图志直接转译英国海军海道测量局 China Sea Directory 一书,并充分利用英国海军所测绘的中国海图资料,分类叙述中国沿海沿江的航道港湾、道礁浅滩、潮汐流速、气象条件等有关轮船航行的技术指南与地理条件。^⑧作为晚清最早由官方翻译出版的西方海道图志,《海道图说》很快在当时知识界传播开来。在清末报刊时论中,就提到“凡西士新译《地理备考》《海道图说》西洋兵书,皆足资我



图1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外景

资料来源:上海图书馆编《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图志》,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1,第21页。

考证”。^⑨在当时出版的目录学著作中,《海道图说》也备受青睐。徐维则《增版东西学书录》就评价:

《海道图说》十五卷,附《长江图说》一卷。海道总图一幅,分图十二幅,长江图五幅。制造局本,十册,上海石印本。英兵船部原书……起自琼州,迄于辽东、台湾。后附朝鲜、琉球、日本各处沙线、飓风、礁石诸忌,胪列详尽。^⑩

与此同时,翻译馆又参照英国海军测绘资料,自行编制《八省沿海全图》,成为晚清官方海图出版的一部力作。《八省沿海全图》全部采用西方铜版技术印刷,由翻译馆傅兰雅、金楷理、王德钧编制,第一版于1874年公开发行,此后多次再版。^⑪全套图集共18大张,79分幅,按照自北向南的顺序,分省配置各海区的航行图、港湾图与航道图,系统、全面、完整地反映了中国海区地理形势,在某种程度上还带有了海防图与兵要地志的功能。^⑫除去上述新式海图的翻译出版,1976年,李凤苞等人陆续译印了整套《平圆地球图》,共有分图2大幅12张。在晚清新旧交替、中西激荡的文化氛围中,《平圆地球图》的印行与传播无疑具有文化启蒙的意义。1903年,宋育仁为四川高等学堂购书的清单中,就有翻译馆出版的《平圆地球图》。^⑬钱基博《读舆地书宜兼看图表》一文亦说道:

自西学兴,而图学愈新,愈详愈确……制造局之《平圆地球图》,益智书会之《平圆地球图》、《皇

朝一统舆图》、《日本地舆方图》,其图皆精于中国。此图之宜看者也。^⑭

截至1879年6月,翻译馆共“刻成地图与海道图共二十七张,海道图大半为英国者,译出后俱在局镌铜板印之,已销售者共四千七百七十四张”(见表1)。^⑮在印刷技术上,所出“地图与海道各图,乃局内所刻阴文铜板所印者”,^⑯有力带动近代中国地图出版印刷技术从手工操作向机械操作的转型。在出版流程上,经过中外译员的通力合作,分成翻译、编辑、刊印、发售等各个环节,组织严密、程序规范。为进一步扩大销售渠道,翻译馆还将地图发行事务委托上海工部局书信馆,借助近代中国的邮政事业邮递至全国各通商口岸,由此开始改变中国传统地图以官方为主体的流通格局,开始迈向“半官半民”的地图发行模式。^⑰

总之,作为晚清官方译书机构的代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地图编译出版活动,促进了近代中国地图出版技术的发展,提升了地图出版内容的水平,在地图出版规模、出版选题、出版流程、出版规范等方面都有新的进步。与此同时,作为晚清洋务运动出版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译印的诸多测绘、舆图书籍,不仅契合了当时关注海防与军事建设的主要内容,更成为中国传统地图流通向近代地图出版事业转型的关键一环,有力推动了中国地图出版与地图市场的近代化发展。

表1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印舆图、测绘书籍

书名	卷数	类别	连史纸版价目	赛连纸版价目	附录
《测地法原》	一卷,一本	图学	二角	一角五分	附图,附表
《测地绘图》	十一卷,四本	图学	九角	六角五分	附一卷,附表
《测绘海图全法》	八卷,六本	图学	一元五角	九角五分	附一卷
《行军测绘》	十卷,二本	图学	五角五分	三角五分	无
《海道图说》	十五卷,十本	地图	二元八角	一元六角(另有扇料,一元二角)	附《长江图说》
《平圆地球图》	一幅	地图	四元八角	不详	无
《八省沿海全图》	一套	地图	四元八角	不详	无

资料来源:《上海制造局译印图书目录》,参见王韬、顾燮光等编《近代译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二) 湖北官书局的地图刊印与出版

就晚清官书局的地图刊印与出版而言,首推湘军名将胡林翼(1812~1861)设局编印《皇朝中外一统舆图》(见图2)。胡林翼在青年时代就推崇经世之学,“笃嗜《史记》《汉书》《左氏传》《司马通鉴》暨中外舆图地志,山川扼塞、兵政机要,探讨尤力”。^④

1853年,清廷调其赴鄂镇压太平军,官至湖北巡抚。胡氏于戎马倥偬之中,发现李兆洛所编《大清一统舆地全图》“州县旗部不无易位,地名亦转多论错”,遂决定在武昌设局,聘请邹世诒、晏启镇“另行编纂舆图供军国之用”。^⑤然而,此图稿甫成而胡即死,后由严树森继请李廷箫、汪士铎修订,书名《皇朝中外一统舆图》,于次年由湖北抚署刊行(即湖北景恒楼刻本)。对此,刘禹生在《世载堂杂忆》中这样写道:

树森始终在胡林翼幕,书札著述,皆经树森手。《读史兵略》《一统舆图》二书,纂助最多。……林翼鉴于三河之败……官军每为向导人所诿,故一败涂地,皆由不明地理所致。乃与树森先治湖北、江西、安徽三省舆图,凡溪港山阜,小路捷径,详细著明,某地至某地若干里,某村至某村绕出快若干里,用以行军。每乘太平军之虚,先据要地,而太平军

用兵上游,不得逞。乃推治各省,远及藩属,所谓“胡文忠地图”也。故该图于长江各省最细密。胡又嘱树森关于史籍所载长江各省用兵,古人成败之略,分条提出,为证明地图之运用;以地图为棋盘,以兵略为棋子。浸久成书,遍及全史,此《读史兵略》所由滥觞。^⑥

然而,《皇朝中外一统舆图》的刊印只是晚清官书局地图出版的滥觞,真正推动并大规模出版各类地图者,则是湖北官书局(崇文书局)。作为晚清湖北的官方出版机构,湖北官书局在刊书宗旨上,“往往有官为之引导,且竭国帑以尽刻一切有用之书籍”,^⑦即以追求实用价值和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特别是张之洞在两湖地区大办洋务后,湖北官书局的书籍刊刻类型,除去经史、算学、兵学书籍之外,舆地图志就成为出版的重点。据不完全统计,晚清湖北官书局先后刊印过《大清一统分省地舆全图》《大清一统地舆图》《南北洋联界图》《光绪湖北舆地记》《鄂省营汛州县驿传全图》《长江全图》《鄂省全图》《两湖合界地图》《武汉城镇合图》《新疆图》等十余种地图,^⑧涉及全国图、防务图、区域图、城市图等多种地图类别。



图2 《皇朝中外一统舆图》书影

资料来源:《皇朝中外一统舆图》,同治二年湖北抚署刻本。

在 1904 年美国圣路易万国博览会期间,湖北官书局出版的这批舆图因为版本珍罕、纸墨精良、刻工精雕,还被当时的湖北省政府选入“崇文丛书”,作为中方的参展图书,不仅受到当地万博会主办方的重视,也收到美国文化界的好评。^③如美国著名报业家 Murat Halstend 在其《路易斯安那购地舆圣路易万博会历史图录》中,就认为中国以出版物的形式向西方世界揭开她的神秘面纱,其中“富有艺术性的照片、地图和地球仪……在人文艺术宫展示世界进步,构成独一无二的展览”。^④作为官方出版机构,湖北官书局地图刊印与出版主要服务于地方行政,并以振兴文教、保存文献、服务乡邦为宗旨,但这并不代表其不追求地图等书籍出版的商业盈利价值。如在晚清湖北官书局的章程中,就有关于售书定价与书籍交易的详细规定:

1. 售书价值照详定章程、不折不扣。
2. 近年经费支绌,业已停刻,仅将现成板片刷印发售。如各衙门有公件饬刊,均由各衙门自行

- 发价。
3. 所售书籍逐日开单呈报,购书如须退换,务在本日之内,次日已经呈报则不及退换矣。
 4. 详定章程,先交书价,再行发书,概不赊欠。
 5. 本处自裁减后,所留司事、夫役无多,购书交价,自行搬取,概不挑送。
 6. 如有因公提取书籍,须奉文照发,以便备案。^⑤

尽管在上述章程中没有言及地图销售的专门规定,但作为湖北官书局书籍出版的重要内容,其地图发售原则无疑需遵照上述规定。换言之,按照上述章程的规定,除去官方因公提取外,湖北官书局的地图出版,不仅遵守了书籍市场的等价交换原则,拥有版权和成本意识,而且还规定了买卖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绝不赊欠。同时,在晚清《湖北官书处书目》的书单中,更有关于湖北官书局部分所刊地图的具体价格信息(见表 2),由此可知在具体经营上,湖北官书局也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加强地图的销售和流通。

表 2 湖北官书局所刻部分地舆图价目

图名	册数	纸张	价格
《大清一统分省地舆全图》	二十六册(面)	竹连纸	装裱每部钱二串九百二十一文(匣子在),未裱每部钱五百二十一文
《皇朝内府舆地图缩摹本》	二本	竹连纸	每部实价钱二百四十文
《长江图说》	五册	竹连纸	装订每部钱七百三十八文,布套在内
《新疆图》	一套	竹连纸	每部实价钱二十六文
《武汉城镇合图》	一幅	白宣纸	每张七百文
《省城内外总图》	一幅	白宣纸	每张八十文
《省城内外分图》	一套	竹连纸	每套一百文
《汉镇街道图》	一张	白宣纸	每张一百二十文
《南北洋联界图》	一套	竹连纸	每套六十文
《鄂省全图》	一张	白宣纸	每张七百文
《鄂省营汛州县驿传全图》《鄂省营制驿传汇编》	一套图四本,书四本	竹连纸	每部实价钱一串二百文
《光绪湖北舆地记》	一套图四本,书二十四本	竹连纸	每部书实价钱二串一百文,图三串五百文
《两湖合界地图》	一套	竹连纸	每套二百文
《光绪湖北舆地大图》	四本	竹连纸	每部实价钱三串二百文

资料来源:《湖北官书处书目》,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

伴随地图出版种类的多元化,湖北官书局的地图出版方式也日趋多种多样,或为自刻自印,或为他刻自印,或为代刻代印等。或由湖北其他官方机构主持刻版,而由湖北官书局重印;或由湖北其他机构主持编制,由湖北官书局代印,故地图版权上多署其他机构名称。如《清一统地輿图》《皇朝内府輿地图缩摹本》等就属于他刻自印,而《湖北省城内外街道详图》《湖北汉口镇街道图》就属于代刻代印,虽为湖北官书局刊刻出版,却分别署名为湖北善后总局刻本和湖北藩司刻本。^⑤浙江官书局也是如此,有的甚至属于私人代刻。与此同时,湖北官书局的地图发售活动,每种都有详细的册数、用纸和精确定价。其地图定价根据质量和成本,规定不同的价格,以满足不同客户的购买需求。如竹连纸往往用于地图集的刊刻,而白宣纸则用于单幅精装地图的出版,因白宣纸成本较高,故其地图售成本也随之增高。湖北官书局刊刻出版的各类地图,所订“书价较廉,多士易于购置”,^⑥主要服务于政府人员与普通知识阶层,这种“半官半民”的地图经营虽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但也不乏商业盈利与市场追求,无疑带有了近代民营地图出版机构的若干特征,为近代中国地图出版转型奠定了基础。

三 学会体制与“译印西文地图公会”的地图出版

(一)“译印西文地图公会”的地图出版计划

自《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出版以后,依靠地理图籍文献的文本阅读和知识交流,逐渐形成了一个非体制化的地理学知识共同体。^⑦这期间,邹代钧创设的“译印西文地图公会”,致力于译印、出版新式中外地图,不仅是近代中国新式地图出版业肇兴的起点,更是清季体制化地理学知识共同体兴起的标志。邹代钧(1854~1908),字甄伯,号沅帆,湖南新化人。他自幼喜欢史地之学,“于测绘地图之事,肆力探究”。^⑧甲午战争,深深触动了邹代钧的家国情怀,^⑨他尝言:“英国兵部、海部之輿图学,开办至今二百余年,未尝或辍。是知彼之雄长五洲,于地

理固研习有素焉。朝廷万几勿遑,吾草莽臣且为之。”^⑩在几位好友的支持下,他于1895年在上海创设“译印西文地图公会”。为推动公会的地图编译工作,邹代钧特意在《时务报》上发布了《译印西文地图招股章程》,制订了一套庞大的地图出版计划。^⑪具体而言,有如下特点。

首先,就地图出版工作的具体内容而言,“译印西方地图公会”力求在广泛搜集最新中外地图资料的基础上,出版一套更为精确的、中外合璧的世界地图全集,全面超越当时国内市场上流通的各种世界地图。要达到这样的宏伟目标,第一步就要慎选底本,保证地图数据来源的准确性。其中,依照《译印西文地图招股章程》,国内部分以胡林翼《皇朝中外一统輿图》、各省新测地图以及光绪《会典輿图》等最新地图为底本,国外部分则参照最新出版的西文实测地图,最大限度地利用所能找到的第一手外文地图资料。第二步则在前述基础上,规范地图译绘流程,统一地图比例尺。不仅要西文地图全部翻译为中文,也要将中文地图计里画方数据转为经纬网数据,并以北京子午线为本初子午线,最终全部改为邹代钧自制的中国輿地尺。^⑫

其次,在地图出版活动的经营特色上,“译印西文地图公会”首次采取“股印”的方式,公开向全社会招股集资,以预约销售的方式吸纳社会资本,筹集地图编译、印刷与出版的费用,这在近代中国地图出版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在《译印西文地图招股章程》中,邹代钧所提出的中外地图翻译与出版计划,国外部分达410幅,国内部分为260幅,其图目总数达到670幅,图绘内容涵盖全球范围,且多采用小比例尺,这无疑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单靠个人或公会社员出资显然无力承担。因此,公会集资招股编绘、印制地图,并不是要“招股合印”进行投资,购股者只是预约购买公会刊印的地图。换言之,这种“股印”的经营模式,就是预收读者认股预订的地图书款,来启动地图公会印制与出版计划的大工程。^⑬

(二) 邹代钧与“译印西文地图公会”的惨淡经营

1897年,“译印西文地图公会”开始遭遇诸多困难,导致地图出版工作一度出现停滞。

首先是地图印刷风波。由于地图公会是民间社团,并无自己的印刷机构,只得到处接洽印刷商。好不容易找到一家石印厂商,却在签约过程中遭遇讹诈。而且这家厂商采用的是传统的石印方法,印制出的地图字小模糊,质量不佳。对此,夏曾佑就抱怨“所印样本,苦不佳,何以子仁竟不能作细工,亦一恨事”。^⑤面对此种情形,邹代钧只能违约停止与前述印刷商的合作,“旋以石印不如铜版之精细,且铜版又可永久留存,随时修改”。^⑥1897年初,邹代钧筹集二千余元,由王肇铤带图前往日本刊印,每张千份。第一批图终于在当年四月得以出版。^⑦

其次是政治与资金风波。1898年夏天,因戊戌变法,清廷下旨禁会。“译印西文地图公会”在政治压力之下,只得改为“舆地学社”,再后改为武昌“舆地学会”。为度过困境,邹代钧惨淡经营,四处求援,为译印地图一度“倾家荡产,炊烟几绝”。^⑧特别是由于地图印刷技术的改变,所用资金数倍于前,整个公会又出现资金周转困境。最终经过慎重考虑,地图公会只得在1897年后停止向社会公开招股。^⑨及至1902年,为推进第二批地图的刊印出版,邹代钧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此前编印的地图内容过于细致,一般读者并不需要,不如先改印大比例尺地图,作为普及地理知识之用,这样销路必广。^⑩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件中,这样写道:

原议第二批出中国地图二百余张,其数既多,且所出尚属一隅,于销路必不能畅。兹已改章,第二批所出,系中国各省总图(一省一张,分图一省多至十余张)、外国各国总图(一国一张,分图一国多至七八张),现在赶办,明春必可出全二批,于中小学堂甚便。^⑪

1902年,张百熙邀请邹代钧入京任职,资助二万元作为译绘地图之资,并答应将地图发给各省学

堂作为教学之用,地图公会的困境暂时得以缓解。1903年,第二批图面世,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中外舆地全图》。^⑫从内容上看,辑入《中外舆地全图》的68幅地图中,有世界地图1幅,半球图2幅,各大洲全图6幅;国内图幅计全国总图1幅,分省图24幅,此外为外国图,共34幅。无论是在资料采用,还是数学基础与表现方法上,都堪称近代地图集的代表性作品。

为保证地图印刷的精美,邹代钧还通过黄遵宪专门引进了新式印刷机,使用烂铜版法印制《中外舆地全图》。^⑬由此方法印制的地图色彩鲜明美观,与旧式地图有天壤之别,故《中外舆地全图》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彩印地图集。^⑭《中外舆地全图》出版后,不仅受到当时教育界的喜爱,也受到文化界与政府部门的重视,如在1906年外务部《地图分编简明目录》中,就将该图列于“中”字部“总图”之首,推荐为外交人员的常备参考用书。^⑮正是“译印西文地图公会”与邹代钧的不懈努力,使地图出版作为一种独立的出版事业得以初步形成,“由是邹氏地图,屹然为天下重”。^⑯然而,由于地图公会以推广舆地学为任,不以盈利为宗旨,加之学会松散的管理体制,邹代钧的地图经营一直面临诸多困难,这也是困扰其市场拓展的根本因素。

四 清末民营地图出版业的兴起和发展

(一) 亚新地学社与民营地图出版业的初兴

应该看到,邹代钧在早年创办“译印西文地图公会”时,该会仅仅是一个地学团体,缺乏专门的地图印刷机构,所以常常受到承包商的掣肘。因此,创办属于自己的地图印刷出版机构,或者说最终将学会性质的“译印西文地图公会”转型为专业地图印刷出版机构,当是邹代钧梦寐以求的事情。^⑰在近代中国地图出版史上,最早成立的专业地图出版机构是亚新地学社,延续时间长达54年。它的成立代表了清末以来地图出版业的产业化方向,标志了近代民营地图出版机构的逐渐崛起,预示了近代中国地图出版市场的初步繁荣。

亚新地学社的创办人是邹氏地学的第五代传

人——邹永煊(1870~1950),字焕廷,系邹代钧族侄。1898年,邹代钧命其前往上海,代为购买石印机二台,开办一个地图印刷所,取名为“亚新舆地学会”。^⑦邹代钧辞世后,邹焕廷将在上海的“亚新舆地学会”迁回武昌细横街(今民主路),先改为“亚新铜版彩印地图局”,后改名为“亚新地学社”。^⑧之所以命名为“亚新”,是取“亚洲”和“新化”的第一个字,寓意既要有世界眼光,又不能忘家学渊源。^⑨对此,罗元鲲就坦言:

光绪三十四年,学部拟以山东提学使任用,而公(指邹代钧)已病偏枯,卒于武昌舆地学会,年五十五。其时公弟子宁乡周震麟在侧,以师身后萧条,舆地学会无力续办,建议当道将学会地图底片,收归学部得取代价以贍后人,周君报师之功伟矣。其一部分底片,由公房侄邹永煊及子兴钜继承,在武昌另创“亚新地学社”,邹氏世业,得以不坠。^⑩

可以说,无论是“译印西文地图公会”还是亚新地学社,都是邹氏家族的传承,两者之间相互交融,是一脉相承的共同体。因此,在亚新舆地学会在上海成立之初,邹代钧出大量资金支持亚新地学社的创办。换言之,亚新地学社的前身——亚新舆地学会在1898年初创于上海之时,明显是“译印西文地图公会”(武昌舆地学会)的印刷分部。至1908年学会解散,亚新地学社回迁至武昌后,在继承邹氏地图遗产的基础上开始独立发展,向编绘、出版和印刷三位一体的专业地图出版机构转型。

成立之初的武昌亚新地学社规模较小,因陋就简,除去百余平方米的厂房,只有两台手摇的四开落版石印机,印刷地图时由家人亲戚帮助,以减少成本,可谓艰难创业。^⑪然邹代钧去世后“译印西文地图公会”所存留的铜版仪器,特别是皇朝一统图铜版、世界全图铜版、历朝图铜版以及湖南省图铜版全套,^⑫均由亚新地学社所继承。这些宝贵的地图铜版成为日后亚新地学社在近代中国地图出版市场崛起的重要基础。亚新地学社在清末出版的地图中,最早的是1905年的《皇朝分省图》,此图以邹代钧武昌舆地学会《皇朝直省图》为基础,内有全

国总图和各省分图,比例不等,彩色印刷,图廓25.2cm×17.5cm,至1909年已经出5版,并增加“中国地势图”1幅,地势分层设色。^⑬总的来看,亚新地学社在清末仅仅是一家小规模家族企业,其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所出版的地图尚是“译印西文地图公会”(武昌舆地学会)的余绪。但作为首家独立的专业地图出版机构,其成立在近代中国地图出版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商务印书馆与民营地图出版事业的发展

相比亚新地学社成立初期的局限性,对于清末地图出版市场有重大影响的综合类出版机构,首推上海商务印书馆。据统计,辛亥年间商务的出版物顺序,依次为①教科书、②政法书、③地图、④杂志、⑤小说、⑥簿册、⑦排印古籍。^⑭换言之,清末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业务格局中,地图的贡献仅次于面向学子的教科书和考试所用的政法书,成为排位第三的重要出版物类型,由此也可以推想地图部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内的重要性。至1912年,商务“历年编译图书已出版者,凡一千二百余种,计书四千余册,又图一百数十幅”。^⑮其中,属于地图类的,计有“世界总图,七种,十二幅;本国总图,五种,十幅;各省分图,二十种,二十幅;都会商埠专图,六种,六幅”。^⑯应该说,商务这一时期内的地图出版业绩,在近代中国地图出版史上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在清末商务地图出版物中,《大清帝国全图》是最著名的“拳头”产品,在近代中国知识界流传甚广,影响深远。^⑰此图初版时间为1905年,总计1册,共列彩图25幅,其中第一图为全国总图,余下依次为分省区域地图,绘制风格与邹代钧1903年出版的《皇朝直省图》相近,当年4月初版发行不久即发行第2版。1908年又发行第3版,封面改题为“宣统元年第三版”,1910年又发行第4版,在数年之间连版四次,足见其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⑱19世纪后半期以来,伴随西方测绘技术和制图工艺的传入,地图集的风貌也随之发生较大的变化。相比于此前出版的传统地图集,《大清帝国全图》不仅采用新式铜版精印工艺,使用红、绿、蓝、棕、黑五色彩

印,还采用进口胶版或铜版纸印刷,图面清晰悦目,一改过去线装旧图面貌。^⑧相比于中国传统的线装地图集,此图采为单面印刷蝴蝶装订技术,图册封面、封底均为淡绿色麻布装裱,正中自上而下书“大清帝国全图”六字,下方配以“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字样,制印十分精美,是清末采用新法编印、装帧和出版地图集的代表之作(见图3)。^⑨



图3 商务印书馆1905年版《大清帝国全图》封面

资料来源:商务印书馆编辑《大清帝国全图》,商务印书馆,1905。

此外,商务印书馆还积极通过广告营销的手段,大力推销商务地图出版物。例如,在当时上海最重要的报刊媒体——《申报》上就有关于《大清帝国全图》的广告。近代以来,广告的刊登,品牌的塑造与标记的确立,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⑩商务版地图广告的一个特征,就是以较突出的字体标出“商务印书馆新出五彩地图”的字样,通过强调《大清帝国全图》地图文本的权威性,进而树立明确的商务版地图品牌形象。^⑪与此同时,地图作为清末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代表性作品,“凡有国家或地

方赛会,如劝业会、博览会、展览会、陈列所等之组织,恒蒙征集出品,叠获褒奖”。^⑫商务印书馆在中外博览会所获奖励中,地图大多是排位第二的重要类型。

作为清末民间地图出版机构的代表,商务印书馆无论是在技术水平、内部管理还是市场营销上,都与新的历史时代合拍,使上海逐渐成为当时中国地图出版业的中心,由此开启了近代中国地图出版业的新潮流。特别是商务印书馆依托雄厚的资本、多元股份制和发达的发行网络,使新式地图编印与新式出版发行实现了紧密结合与良性互动。不惟如此,在晚清危殆的时局中,商务印书馆所做出的一系列努力,都试图弥合国家与民众、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缝隙,进而激发民众的爱国精神与民族主义观念,地图出版物也由此深深嵌入晚清以来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成为讨论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的重要文本之一。

五 结语:晚清新式地图出版业兴起的总体特征

从历史分期来看,以1895年为界标,晚清新式地图出版业大致可分为两大时段。前期主要是以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官书局等官方地图出版活动为主,在技术层面上开始引入西方的印刷技术,但传统雕版技术也占据重要地位。后期则是“译印西文地图公会”、亚新地学社和商务印书馆等公会与民间地图出版机构的兴起,在技术上西方印刷技术得到大规模应用。作为传统地图出版活动与新式地图出版业的分野,晚清新式地图出版业明显带有过渡期的特征。

从空间布局来看,晚清新式地图出版业的活动中心有二:一是上海,二是武昌。这种局面的出现,前者可看作近代中国都市化的集聚效应,后者可以看作两湖舆地学传统的现代回响。特别是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凭借特殊的地理条件,不仅成为近代西学东渐的入口与中心,也是西方“印刷资本主义”传入的桥头堡。在这样独特的城市文化氛围下,近代中国地图出版业在

上海的勃兴,绝非偶然所致。武昌作为近代地图出版业的另一个中心,其形成背景则与清代湖湘舆地学的繁荣与经世致用的学风有关。特别是1861年汉口开埠以后,又得对外开放风气之先,其成为晚清地图出版第二大中心顺理成章。

从发展脉络来看,晚清新式地图出版业走向现代性的具体标志有四:一是新式机器印刷技术开始运用于地图出版,使近代中国地图出版业逐渐摆脱了传统雕版印刷的局限;二是地图出版专业化水平逐渐提高,从事地图出版的专业机构开始出现,地图出版物得以大规模面向知识阶层,促使行业主体逐渐过渡到以公会、民间为主,官方为辅的格局;三是在经营方式上,晚清的新式地图出版机构虽性质各异,但大都独立面向市场经营,专门化的地图发行网络与流通体系因此得以初步形成;四是在文本内容上,新式地图出版物多吸收西方地理科学知识,在内容上突破了传统知识体系。

综上所述,晚清新式地图出版业以专业出版机构的兴起为标志,以产业经营与地图市场的相互结合为特征,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地图出版业走向现代性的特征,这也为民国时期地图出版业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基础。在晚清中国地图出版业的兴起过程中,官方、学会与民间地图出版活动相辅相成,一方面以救亡图存为旨归,一方面寻求市场支持,逐渐摆脱了传统地图出版与文本内容的局限。在中西文化交汇的大转折时代,由新式印刷技术、新式出版机构成立所催生的新式地图出版物,深深嵌入社会文化变迁的脉络之中。

注释:

①[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叟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38页。

②[美]通猜·威尼差恭:《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袁剑译,译林出版社,2016,第172~173页。

③陈潮:《中国近现代地图出版概况》,《中国地图学年鉴(1990)》,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第131~133页。

④葛绥成:《清季民初地图出版工作及出版物》,张静庐辑

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群联出版社,1954,第77~89页。

⑤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129~197页。

⑥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322~329页。

⑦傅良瑜:《“译印西文地图公会”的地图出版》,《出版史料》2006年第3期;周岩:《邹氏家族和我国地图编绘出版事业》,《出版史料》1989年第2期;陈竹:《清末至民国亚新地学社地图编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2;文士员遗稿《邹氏地学与亚新地学社简史》,文榕生整理,邹逸麟、张修桂主编《历史地理》第2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等等。

⑧陈潮编著《图情六十年》,中国地图出版社,2004,第299~376页。

⑨李明杰:《我国近代地图出版业的文化贡献》,《编辑学刊》2001年第6期;石冰洁:《晚清至民国上海民间地图的绘制出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中国传统文化与典籍论丛》,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李鹏:《民国〈申报地图〉的编制出版与文化政治》,刘中玉主编《形象史学》2019上半年(总第1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等等。

⑩李鹏:《清末民国中国历史地图编绘与民族国家建构》,《史林》2018年第1期。

⑪胡国祥:《近代传教士出版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第38页。

⑫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述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香港)第60期,2000年;《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人文地理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⑬席会东:《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中国地图出版社,2013,第117页。

⑭石冰洁:《清代私绘“大一统”系全图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7,第11~17页;[韩]李明喜:《清代全国总图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1,第60页。

⑮[韩]李明喜:《清代全国总图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1,第56页。

⑯石冰洁:《清代私绘“大一统”系全图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7,第33页。

⑰席会东:《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第117页。

⑱李孝聪:《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第194、199页。

①9 石冰洁:《清代私绘“大清一统”系全图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7,第89~111页。

②0 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商务印书馆,2000。

③1 参见[日]荒川清秀《日语地理学术语的形成和传播》,[德]朗密榭、费南山主编《呈现意义:晚清中国新学领域》(下),李永胜、李增田译,王宪明审校,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第447~464页。

④2 范祎:《中等地理教本序》,(英)汉勃森:《中等地理教本》卷首,任廷旭、范祎译,广智书局,1907。

⑤3 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第282页。

⑥4 林超:《中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张相文和中国地学会》,《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

⑦5 陈潮:《中国近现代地图史略》,《图情六十年》,第323~338页。

⑧6 [美]芮哲非:《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张志强等译,郭晶校,商务印书馆,2014,第32页。

⑨7 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简明中华印刷通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319页。

⑩8 黄式权:《淞南梦影录》,郑祖安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118页。

⑪9 韩琦:《晚清西方印刷术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石印术的传入为例》,韩琦、[意]米盖拉编《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商务印书馆,2008,第114~127页。

⑫0 [美]芮哲非:《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第121页。

⑬1 North China Herald(《北华捷报》),25 May,1889,p.567.

⑭2 王树连、史庆和、王晓迪:《中国测绘教育史》,解放军出版社,2011,第120页;时培磊:《明清日本研究史籍探研》,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0,第172~178页。

⑮3 王肇铤:《铜刻小记》,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5),中华书局,1957,第298页。

⑯4 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简明中华印刷通史》,第320页。

⑰5 陈洙编《江南制造总局译书提要》卷2,宣统元年七月刻本。

⑱6 王扬宗编校《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文献与史料选编》(下),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第486页。

⑲7 陈洙编《江南制造总局译书提要》卷2。

⑳8 喻沧、廖克编著《中国地图学史》,测绘出版社,2010,第326页。

㉑9 沈毓桂:《西学必以中学为本说》,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516页。

㉒0 徐维则:《增版东西学书录》地学卷20,熊月之主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第122页。

㉓1 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2期。

㉔2 江家君:《近代历史海图研究》,测绘出版社,1992,第70~76页。

㉕3 李晓宇:《维新运动时期西学在四川的传播——从四川高等学堂档案中的“宋育仁购书清单”出发》,吴佩林、蔡东洲主编《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365~386页。

㉖4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2012,第406页。

㉗5 [英]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1),第22页。

㉘6 [英]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1),第18页。

㉙7 熊月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1卷,湖北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第591~592页。

㉚8 梅英杰等:《湘军人物年谱》(1),李润英标点,岳麓书社,1987,第201页。

㉛9 文士员遗稿《邹氏地学与亚新地学社简史》,《历史地理》第20辑。

㉜0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钱实甫点校,中华书局,1960,第39~40页。

㉝1 黄嗣艾:《湖北省立官书处本末记》,杨海清、汤旭岩主编《湖北官书局版刻图录》,湖北教育出版社,2014,第239页。

㉞2 《湖北官书处书目》,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第37页。

㉟3 [美]居蜜主编《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中国参展图录》3(汉籍珍品域外流传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2页。

㊱4 Murat Halstead, Pictorial History of the Louisiana Purchase and the World's Fair at St. Louis (Philadelphia, PA: Frank S. Brant, 1904), pp. 354-355.

㊲5 《湖北官书处章程》,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第20页。

⑤李明杰:《近代湖北官书局(崇文书局)刻书论略——从版本目录信息分析的视角》,范军主编《崇文书局及晚清官书局研究论集》,崇文书局,2017。

⑤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1卷,第471页。

⑤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第312~322页。

⑤邹永敦:《邹氏地理源流记》(1946),杨亦农:《湖南历代文化世家:新化邹氏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第260页。

⑥张平:《邹代钧与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萌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⑥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2010,第64页。

⑥《译印西文地图招股章程》,《时务报》第1册,光绪二十二年。

⑥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第328页。

⑥江凌:《清代两湖地区的出版业》,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第343~344页。

⑥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1319页。

⑥汪治年:《穰卿先生传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第337页。

⑥周艳红:《邹代钧与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⑥《泗阳张沌谷居士年谱》,张相文:《南园丛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87页。

⑥傅良瑜:《“译印西文地图公会”的地图出版》,《出版史料》2006年第3期。

⑦廖梅:《晚清的民间招股印书》,《档案与史料》2002年第3期。

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812页。

⑦邹代钧:《中外舆地全图》,光绪二十九年(1903)武昌舆地学会编译刊行,“序例”。

⑦周茹燕:《我国最早的教学地图集——清代〈中外舆地全图〉》,《地图》1988年第1期。

⑦周艳红:《邹代钧与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⑦周茹燕:《我国最早的教学地图集——清代〈中外舆地全图〉》,《地图》1988年第1期。

⑦罗元鲲:《新化邹氏舆地学会与亚新地学社》,民国湖南文献委员会编《湖南文献汇编》第1辑,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第153页。

⑦杨亦农:《湖南历代文化世家:新化邹氏卷》,第122~123页。

⑦邹协勋:《记亚新地学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第23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208~210页。

⑦武汉市勘测院编印《武汉测绘志》,1990,第30页。

⑧王肇槐:《“亚新地学社”名称的由来》,《武汉文史资料》1993年第3辑(总第53辑),第100~101页。

⑧罗元鲲:《新化邹氏舆地学会与亚新地学社》,民国湖南文献委员会编《湖南文献汇编》第1辑,第153页。

⑧詹勋:《邹焕廷与武昌亚新地学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武昌区委员会编印《武昌文史》第4辑,1988,第87页。

⑧邹协勋:《记亚新地学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第23辑,第208~210页。

⑧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舆图组编《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藏6827种中外文古旧地图目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47页。

⑧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创业诸君》,《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第16页。

⑧《商务印书馆成绩概略》(1913年),汪耀华编《商务印书馆史料选编(1897~1950)》,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第10页。

⑧《商务印书馆成绩概略》(1913年),汪耀华编《商务印书馆史料选编(1897~1950)》,第12页。

⑧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大事记》,商务印书馆,1987,第19页。

⑧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舆图组编《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藏6827种中外文古旧地图目录》,第45页。

⑧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等:《中华印刷通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99,第694页。

⑧阎平、孙果清等编著《中华古地图集珍》,西安地图出版社,1995,第87页。

⑧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商务印书馆,2005,第299页。

⑧《大清帝国全图·广告》,《申报》1905年8月12日。

⑧《商务印书馆志略》(1930年),汪耀华编《商务印书馆史料选编(1897~1950)》,第91页。